

我對卜卦，有點興趣，也有點懷疑。甚至，不免逆反心理：想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從上海坐夜航班機，去廣西北海——我在那裡有房子——並從飛機上俯瞰大地，瞧瞧所謂的「人類最後一夜」，究屬何般模樣；待天大亮後，坐在北海敞亮的客廳裡，寫一篇散文，瀟灑地戳穿「十二月二十二日黎明不會到來」的預言。

證明人類的巍然存在，匹夫有責！

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巴比倫文明，拜占庭文明……創造了這許多文明的人類，生命硬朗得很；在某日之內毀滅，實屬天方夜譚。

要說毀滅，當然是有的，但人類不會毀滅在上述「預言」裡，人類倒是常常毀在自己的手裡——不光是環境污染、生態危機。

譬如，似是而非的理論。

一八七五年，在哥達，通過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綱領。恩格斯說：「整個綱領都是雜亂無章、毫無聯繫、不合邏輯和丟臉的」，「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是應當加以批判的」，但「資產階級新聞界的蠢驢們沒有這樣做，反而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對待這個綱領，領會出其中所沒有的東西，並做了共產主義的解釋。工人們似乎也是這樣做的。」

這不是不是人性的弱點？對革命者，吃飯、走路、咳嗽，都能領會出其中的革命意義；因為聲稱是搞共產主義的，全社會都對它作出共產主義的解釋！

似是而非的理論。

常常被人輕信，想當然地拔高，朝好的方面理解。難怪恩格斯要擔憂。這種綱領，只會把工人運動引向毀滅。

朱大路

我們當年，是在「五·七」幹校，工宣隊的帶領下，學這段歷史的。我們走的路，也被自己拔得很高。

之前見內地報紙上，有文章為《辭海》「記失」，認為《辭海》對「個人主義」的理論詮釋，在幾次改版後，仍可商榷。此文作者巢峰說得有理由——

自言自語

人生在線

《辭海》第二版，對「個人主義」從頭到尾都是批判，把反對「個人主義」說成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之一」。

「個人主義」主要不是從思想、作風方面論述，而是作為一門思想和學說加以闡述。但把「個人主義」說成「伴隨西方資本主義而出現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和學說」，值得推敲。因為「個人主義」早於資本主義幾千年。

認為《辭海》還有一點未提到：個人主義並不隨着私有制消滅而消滅，消滅個人主義比消滅階級要難上若干倍。

堂堂辭書，人們心目中的主臬，也沒從理論上完全說清楚「個人主義」，叫人們如何去正確對待個人主義？指不定又把不該毀滅的給毀了！

有一回，我聽到一種「吐痰論」，很興奮，吐痰居然有理論了，那總結屎尿也為時不遠了。聽到後來，才明白，是用「無主的餛飩」比喻「國有資產」，誰朝「餛飩」上吐一口痰，「餛飩」立馬就屬於誰了。

三下五除二，我總算明白：這一口痰吐下去，總有東西要被毀滅了。

又有一回，聽到「差距論」：「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在農村的四堂兄的五表哥、進城打工的三叔父的二外孫，對此都表示不同意。我也開始弄清，這種「差距」繼續拉大、拉大，總有東西要被毀滅了。

終於，有一回，我不等別人起來發言，自己就能作出判斷了。那是一種我笨拙地概括為「取消和保持論」的理論：「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我熟知和知道，這樣下去，老夫我也要被毀滅了！

還有一些理論，更難懂。但我們卻對它們作改革開放的解釋，就像德國工人對「哥達綱領」作共產主義解釋一樣。

六 新年，是年年要過的，年年都應該有長進。不會毀滅的不要擔心它毀滅，可以毀滅的應該促使它毀滅，不該毀滅的隨時可能被毀滅，理應毀滅的其實並沒有毀滅。我不是在說「繞口令」，只是自言自語。

狄更斯誕辰二百年

王亞蘭

二〇一二年不光是倫敦的奧運年，也是英國的「狄更斯年」，藉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一八一二至一八七〇）誕辰二百年之際，英國有關方面自二〇一一年下半年起至一二年六月間

域外漫筆

，透過專題講座、大型展覽、上演話劇、電影專場及出版紀念刊物等形式，在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展開大規模的紀念活動，讓後人緬懷這位文學巨匠輝煌而短暫的一生。狄更斯的成名地倫敦，成為是次紀念活動的中心舞台。

由倫敦博物館主辦的大型展覽《狄更斯與倫敦》是紀念活動的重頭戲，館長艾力斯·雲納表示，該展覽分五大部分展出，館中的展品是由二十二個相關機構提供，包括了繪畫，作者的六部小說中的部分手稿，寫作的書枱和椅子、宣傳畫、戲服等；人們難得一見的展品，當屬由昔日著名的私人銀行 Coutts 提供的狄更斯的銀行帳目冊，它詳細記錄了家庭中的收入和支出。

雲納表示，是次展覽的目的將狄更斯的生活、創作、人物及場景融入當年的繪畫、圖片及實物中，還原出一幅近二百年間、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的真實原貌。展覽為期七個月，跨越聖誕期、作者的誕辰日（二月七日）及長眠日（六月九日），這是博物館四十年來首次為狄更斯舉辦大型的展覽活動，此外還有多項狄更斯宣傳活動也同時展開，旨在吸引中小學生們的參與。

筆者在展覽開館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前往該館參觀，原以為自己是第一批參觀者，早上十點一刻，在展廳入門處已站滿了狄迷們，一對美國遊客告知，他們是在倫敦旅遊期間獲得這一信息，特地前來參觀展覽的。

在展館的第一部分「想像中的城市」瀏覽時，被一幅幅昔日城市的舊照片所震憾，交通擁擠、人口膨脹、貧窮落後，與今日的倫敦相比可說是「天堂與地獄」。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對筆者感嘆道：二百年前的倫敦仿如隔世；此時狄更斯對高芬花園街市描述的畫外音隱約傳來；不經意間想起桑德斯先生在《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中對狄更斯的評價：「雖然他的生和死都不在倫敦，但是他卻創造了一個萬花筒般的、實實在在的倫敦，讓這個十九世紀最大的城市成為他作品的中心，讓倫敦毫無生氣的、縱橫交錯的大街小巷成為他靈感的主要來源。」

狄更斯自一八二二年隨家人搬至倫敦後，在這座城市中生活、工作近四十年，有學者評價他為「倫敦的活地圖」。他每天在城市漫步二十多公里，在白天、在晚間徜徉在大街小巷中，觀察小市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交談，將這些活生生的人物融入現實的場景中，拉近了作者、小說與讀者間的距離，今日人們依然看到《小杜麗》、《孤兒流浪記》（又名《奧立弗·退斯特》）以及《大衛·科波菲爾》中的真實街景。

從展覽的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娛樂大眾」、「溫暖的家」、「狄更斯與現代化時代」中，看到了一個忙碌而多面的狄更斯，一組組話劇宣傳畫是他喜愛觀賞和參與話劇表演的實證；一張珍貴的寫字枱、一幅「狄更斯的夢」的繪畫，是他十四部小說、上千個人物的結晶；一本巨大的銀行帳簿記錄了他沉重的經濟負擔，養活妻子、九個孩子及五個幫工等；與髮妻離婚後，這架機器的運轉速度更為驚人，終於在一八七〇年辭世。

研究狄更斯的學者們指出，從展覽的第五部分「生命與死亡」的展品中，如一副孩童的小棺材、一幅窮苦人家與小孩在風雪之夜露宿街頭繪畫等，精確地勾勒出狄更斯心靈深處的創痛，鞋油廠的童工之苦、父親欠債坐牢，妻妹年輕喪命，自己的兩個嬰孩

早夭等，這些創痛為狄翁關注孤兒問題、窮困孩子教育等社會問題埋下了伏筆，讓他在小說天地中傾訴心聲。

在紀念狄翁誕辰之時，英國廣播公司利用電視、電台的宣傳平台，向民衆介紹狄更斯的生平、創作及其作品。廣播公司還全新打造新版的電視劇《遠大前程》和狄翁未完成的作品《艾德溫·德魯德之謎》，在聖誕期間推出，讓電視觀眾一飽眼福。著名的《泰晤士報》不但積極參與《狄更斯與倫敦》的展覽活動，同時藉助該報版面，向讀者介紹一段段鮮為人知的狄翁趣事，如一八三三年，年僅二十一歲的狄更斯希望通過舅父在《泰晤士報》工作之便，能為自己在該報謀一份穩定職業，結果未能成功。此外，《泰晤士報》還以四大版的篇幅，圖文介紹「狄更斯文學之路」的步行路線及距離，為讀者們提供新的活動信息。

倫敦的「查爾斯·狄更斯博物館」是狄翁在一八三七至三九年間，在市中心的道蒂街租住的房子，當年他在此裡創作《孤兒流浪記》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等小說；該房子自一九二四年起成為狄更斯永久個人紀念館。二〇一〇年該館獲得「國家文化彩基金」兩百萬英鎊的專款，為博物館修建一個書庫，作為一萬冊狄翁的書籍、大批量的文件及手稿真跡作永久性的保存之地。在是次紀念活動中，該館將會組織大型國際研討活動、到倫敦「詩人之角」敬獻花圈及文學步行之路等活動。

狄更斯的出生地樸茨茅斯會組織相應的專題講座、戶外表演等活動，在狄翁的生辰日，出生地博物館會免費開放，吸引更多的狄迷進館參觀。狄更斯的童年及晚年生活之地，如羅徹斯特、查塔姆等地，開展與眾不同的紀念活動，在「狄更斯世界」的固定場館內演出話劇；在聖瑪麗教堂的墓地進行文學講演活動。

英國皇家鑄幣局會在二月份發行新版的兩英鎊面值的狄更斯紀念硬幣，硬幣中的圖像是將小說中的人物疊成狄翁人面像，設計師但特表示，該畫像極為新穎，希望其創意為狄迷們所喜愛。

除了在全英各地舉辦為期近一年的紀念活動外，英國文化協會與電影公司、圖書出版商等機構聯袂，在全國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新加坡、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家，開展狄更斯文學名著等宣傳活動，讓狄更斯的文學魅力在全球各地綻放。

燈下集

作家話譯新意多

鄭延國

縱觀浩浩蕩蕩的當代作家隊伍，似可發現其中不乏對翻譯饒有興致的「粉絲」。譬如劉心武、梁曉聲、莫言三位就對翻譯有過不少熱切的議論，而且頗具新意。

劉心武說：「讀外國作家作品，翻譯家給了我中文的語感。讀譯著，可以吸收的營養是很多的，卻不大可能吸收到原著在語言上的精華。」顯而易見，劉心武的意思是：翻譯作品雖然能向不懂外文

的讀者輸送各種各樣的營養，諸如新鮮的思想，奇特的內容，動人的情感，美妙的景色等等，但原作者那種原汁原味的語言表達方式卻是無法窺見的。聰慧的劉心武心知肚明，所謂譯文完全是在翻譯家動了這樣那樣的「手脚」之後才形成的，因此這些譯文只能「給我中文的語感」。這一高見堪稱一語道破翻譯的玄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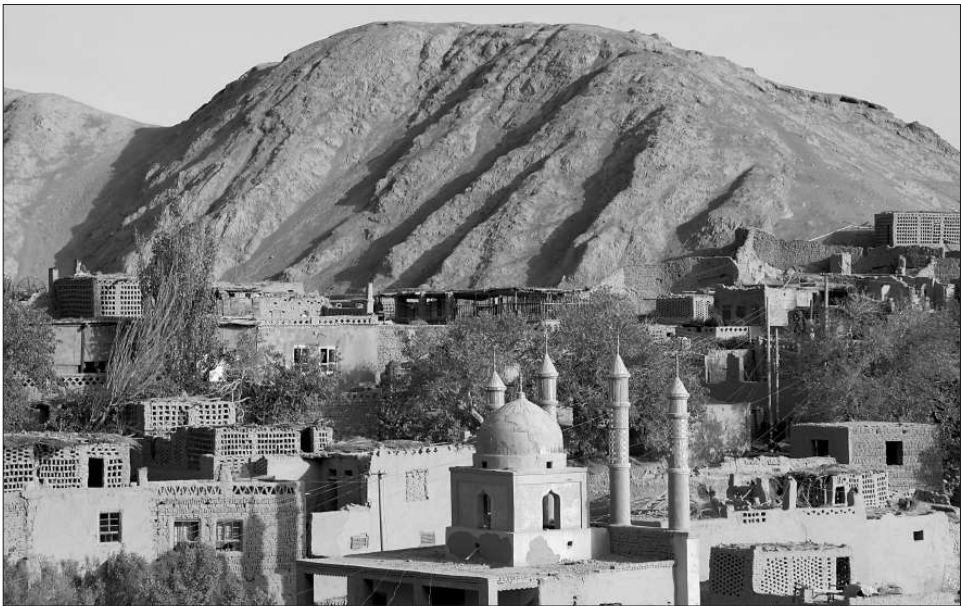
梁曉聲這位與共和國同齡的東北人，童心不泯，他以形象的比喻道出了自己對翻譯的見解。他說：「一部上乘的翻譯作品，如同兩類美果成功雜交後的果子。」梁曉聲這個比喻的深層含意分明就是：身手不凡的翻譯家恰如生物學家一般，左手托着一種美果即典雅的母語，右手托着另一種美果即華麗的原文，然後通過一番運作，巧妙地將它們結合於一體，形成第三種美果即一流的譯文。以小說《紅高粱》而走紅文壇的莫言，其視線主要集中在翻譯家身上。在他看來，翻譯家首先是締造者，通過他們的創造性勞動，「文學的世界性才得以實現」，「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才得以形成。其次，翻譯家是引進人，他們把大量的外國作品譯成中文，使「像我們這樣一批不懂外文的作家」認知了外國文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再次，翻譯家是輸出者，他們將中國作家創作的優秀作品譯為外語，令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員，「被西方讀者閱讀」。再次，翻譯家是外語專家、母語文體家，甚至還是語言學家，「他們不僅僅是用卓越的勞動讓我們了解外國作家講述的故事、講述故事的技術，通過故事表現出來的思想、他們還豐富發展了我們的母語」。由是，這位彪悍豪爽的山東大漢無限感慨地嘆唱道：翻譯家的辛勤勞動真是「功德無量」啊！

竊以為，上述三位作家的評說至少能給從事翻譯的人們帶來三點啓示。第一，肩負重任大。須知，譯者們大筆一揮，無論

是外譯中，還是中譯外，便是在替「世界文學」添磚加瓦，豈能容得半點馬虎？第二，譯語務求上乘。譯者們筆底汨汨流出的漢字或外文，普通讀者也許不會挑剔，但到了作家的眼皮底下，他們就會有所思量。一方面，他們會仲裁譯語的表達是否符合母語的「語感」，另一方面，他們亦期冀獲取原語新鮮的說法。第三，譯技必須嫺熟。譯者一定要善於操控外語和母語，將兩種語言的特色再現於譯語之中，化作一種別有滋味的「美果」。

所幸翻譯界真還有不少這樣的譯者。譬如，翻譯 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的譯者，煞費苦心地將「一箭雙鵰」的形美與 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的意美雜合在一起，形成「一石二鳥」的譯語，便毫無爭議地擴大了中國作家們的語料庫。

又譬如頗諳翻譯之道的毛澤東曾將自己提出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的「紙老虎」親自遂譯為 paper tiger，由是造成巨大的影響。paper tiger 這一譯法不僅被收入英美人編纂的各種辭典，而且為不少英美文人套用。從事翻譯的人們經過慘淡經營而嫁接出來的譯語，對思如泉湧、筆走龍蛇的作家們的幫助，由此可睹一斑。看來，給他們以「功德無量」的高度評價，實在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兒啊！



新疆吐峪溝麻扎村

（攝影）于軍

說抱歉

盧茜

說抱歉時應分場合，如果該說不說就顯得欠缺禮貌，要是沒說而說了，也會有自擅責任的後果。中西文化不同，西方人常把「謝謝」、「對不起」掛在嘴邊。

當他們打個噴嚏，會說「excuse me（抱歉）」；在巴士或地鐵，下車時請人讓路也會說「excuse me（勞駕）」。

中國人打完噴嚏，可能會說「我鼻敏感」；下車會說「我下車」。香港電視上常播放一個賣傷風藥的廣告，有兩個人站在巴士站等車，其中的男士打了一個大噴嚏，將身邊女士的頭髮噴向一邊，然後只說「好辛苦

不唱堂會

陳魯民

文化什錦

人，不論你給多少錢，都不肯給達官貴人唱堂會，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搞的是藝術，是很神聖的，不是給有錢人幫閒的玩意兒。上世紀三十年代，紅透半邊天的京劇名伶劉喜廷，氣死譚鑫培這樣的話。豫劇大師常香玉也有類似的遭遇，有個三青幫頭子要小叫兒就

星一點啓發。今天的藝人，受人尊重，收入豐厚，社會地位很高，有的還是大代表、政協委員，（此次唱堂會的就有四個全國人大代表，還有一個還是常委，）理應更加自尊、自愛，盡量或不要為幾個錢而去為富豪顯貴唱堂會，那雖然鈔票很厚，但卻於自己名聲有損，實際上

是得不償失的。當然，沒有任何規定說，明星不能唱堂會，煤老闖花巨款請明星唱堂會是一個頗頗打一個頗頗打的事，與法法法德德德無礙，但藝術家們的尊嚴、操守、口碑呢？尊嚴就可以棄之如敝屣嗎？舊時，倘有一些藝人為了尊嚴，拒為豪富顯貴唱堂會；今天，我們的藝術家難道就沒有這份淡定與執著，就肯為無方兄折腰嗎？這些年來，我們已經給金錢太多的面子和地位，它幾乎無往不勝，但它在蘊含我們已所剩無幾的神聖和莊嚴，不能再退讓了，我們必須保留一些金錢永遠無法買到的東西，讓希望 and 良知、正義和尊嚴有個棲身之地。

如是我見